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卢川,王文妙.“昭王奔随”相关史实考证[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6):56-61.

“昭王奔随”相关史实考证

卢川 王文妙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昭王奔随”是吴楚争霸中的重要史实。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存在诸多疑点,如吴师入郢路线、昭王所居之郢、沮水和江水所指、“云中”地望以及郢之所在等。结合文献及学者研究成果,可以认为楚昭王所居都城,即在今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楚昭王所奔之郢,应在今荆州松滋南海镇一带;吴人入郢后,楚昭王先逃至松滋一带的郢邑,后逃至随国避难。

关键词:吴楚之争;吴人入郢;昭王奔随

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56-06

吴楚争霸是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因历史久远,史籍零散,史实细节亦多存疑点。“昭王奔随”即是其中的重要史实。楚昭王即位后,吴楚争霸日益激烈,“吴人入郢”即发生在其即位后的第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师西征南伐,郢都失陷,楚君及贵族大举出逃,后世遂有“昭王奔随”的说法。

“昭王奔随”在《左传》《国语》《淮南子》《吴越春秋》《吕氏春秋》《史记》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左传·定公四年》载:“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钟建负季芊以从。……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受史书体裁和时代所限,文献对此事的记载都较简单,加之后世学者对历史地理、文献的理解不同,“昭王奔随”史实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对此问题有专门论述的,以石泉先生^{[1](P323~379)}、辛德勇先生为代表^{[2](P92)}。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昭王所入之“云中”、沮水、江水的理解不同,二是对昭王所居之郢的地望理解不同。因此,还要综合吴师入郢路线、楚国历史地理、楚昭王时期楚郢都位置,以及昭王所

奔之“郢”的地望进行探索。

一、吴师入郢的路线

吴师入郢是楚昭王出逃的直接原因,并决定其出逃方向。《左传·定公四年》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探讨吴师入郢路线,有助于明确昭王出逃的基本方向。

公元前508年,吴伐楚,吴国部分水兵由淮水而西进,与唐、蔡国军队会合。《左传·定公四年》载,吴人至“舍舟于淮汭”,“淮汭”指淮水曲折处。据石泉先生考证,文献中所载“淮汭”在蔡国境内淮水与汝水相汇处。^{[1](P325)}《左传·定公四年》载:“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吴国部分军队于此弃舟登陆与蔡、唐联军会合,向南入楚方城。陈伟先生认为,会合的地点是在方城山丘陵地以东,颍水中下游以西,淮水以北直至汝、颍二水上游的山地。^{[3](P17)}楚左司马戌在方城外及大隧、直辕、冥阨三处重要隘口镇守,大隧、直辕及冥阨地望,几个隘口大致在今河南确山县西与泌阳

收稿日期:2024-09-11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楚简与楚国城市研究”(CWH202009)

第一作者简介:卢川(1981-),男,湖北荆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楚史与楚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王文妙(1989-),女,河南三门峡人,主要从事楚国史研究,E-mail:1205726310@qq.com。

县东。^{[4](P29)}令尹子常则在汉水之滨驻守。楚人意欲借方城及汉水天险以防御吴军。

那么,吴军是否全部由楚方城而入楚呢?这可能还要对“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这句文献进行再解读。其中的“夹”字,后世多解释为“对峙”,但似乎也暗示吴军并非仅一路攻楚。吴楚之争,由来已久。《左传·昭公三十年》载:“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可见伍子胥采取的是疲楚战略,讲求多支部队相互配合。“舍舟于淮汭”及与楚人战于柏举之事,可证吴人攻楚应是水陆并进。据《吕氏春秋·用民》载:“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伐楚之兵应至少分两路。一路为吴王阖闾、夫概所率部队。吴王率“多力”“利趾”的精兵,《吕氏春秋·简选》:“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夫概所率之部,《左传·定公四年》载,阖闾之弟夫概“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夫概之兵与子常部对峙。按前述楚国军事部署,子常兵进汉水之东,故夫概部极可能由楚方城攻入,也包括蔡、唐联军。另一路为伍子胥、孙武及白喜所率部队。据《越绝书》载:“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在柏举之战中,伍子胥、孙武及白喜亦共属一部。对于吴军的这种作战策略,清代学者王谟评价:“示欲舍舟登陆,使楚人悉力守方城外险,而潜以水军从豫章溯流直上,捣其腹心。兵行诡道,声东击西。”^{[5](P3)}在豫章一带,吴国亦布置水兵,凭借豫章水陆交通,向北进于柏举一带与楚交战,这正是伍子胥“多方以误之”军事战略的体现。因此,善用水军的吴人,采取兵分多路、共同配合的攻楚战略,绝不可能集结全部兵力从方城入楚,而是在长江豫章及楚方城外都布陈了兵力。

豫章为该年吴军主力集中之地,但关于豫章地望,古今看法相异。石泉先生从“舟舍于淮汭”,认定吴伐楚路线是由淮河西征南伐,因而吴军所次之豫章,不可能至长江之豫章,并考证吴军所经过的豫章,在今襄阳东北白河与唐河交汇处。^{[1](P360)}李守奎先生^[6]、高崇文先生^[7],亦分别据清华简《系年》及曾侯與编钟铭文,证实石泉先生所考吴人攻楚路线是正确的,但并未考察豫章等地的地理位置。关于吴人所次之豫章的地望,古人已有较多考证。《左传》唐孔颖达疏以豫章“在江北”,晋杜预注以豫章为“汉东北地名”^{[8](P1787)},也即汉水之东、长江以北。王

谟引张守节《史记》正义“豫章口,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今直谓之湖口也”^{[5](P2)},亦以为豫章在彭蠡湖口。从历史军事地理角度考虑,豫章也是吴楚双方历来重要的交战点,双方都很重视。《左传·定公二年》载:“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巢”为古巢国,地在安庆桐城。楚人在豫章伐吴,吴人陈舟于此,却至巢地埋伏,故豫章离巢地不远。《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可见豫章又与越国境相接。另外,《左传》中所记“定公二年”和“定公四年”均引“豫章”之名,更无理由分指两处而故意令人费解,因此,豫章地望应从古人“彭蠡湖口”说,更符合史实。

吴楚双方有过五次主要战争,战争基本局势是吴进楚退,暗含了吴师入郢的路线。前四次交战地点,也即吴军主力所在区域为:豫章、柏举、清发、雍澨。^{[9](P538)}至第五次交战时,楚昭王出逃,这是在吴师入郢的前一天,吴军已离楚都不远了。《左传》中所载柏举、清发、雍澨三地,地望明确。据《读史方輿纪要》卷 76“麻城县”“龟峰山”条下注:“县东北三十里有柏子山。《春秋》定四年‘吴、楚陈于柏举’,盖合柏山、举水而名。”^{[10](P3561~3562)}其“举水”条下注“即春秋时之柏举”。柏举之名,以合山水之名,在今麻城一带。《水经注》卷 31“涑水”条:“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盖涑水兼清水之目矣。”^{[11](P497)}清发为春秋时水名,也即涑水,在今湖北安陆。雍澨,据石泉先生考证其地在今襄阳北^{[1](P387)}。楚人拒吴人于汉水以东,吴人亦无理由西入今襄阳境内。《读史方輿纪要》卷 77 载:“澨水,县西南八十里。源出县西南七十里磨石山,下流合县前河通于汉江。或以为即春秋时之雍澨。”^{[10](P3589)}清洪亮吉、今人杨伯峻亦从之。雍澨即司马河,其址在今湖北京山市石龙镇。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载“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12],“西征南伐”中的“西征”是相对于吴人向西至楚境而言,“南伐”恐是指吴人与楚人战于汉水之东、长江之北大别山西南侧,至京山过汉水后,再向南入楚都的大致表述。

至此,吴师入郢路线可进一步解释为:吴人西征攻楚,兵分两路,一路至蔡国由方城入楚,一路由长江至豫章口,转陆行至汉东、江北一带与楚人相战,两路相互配合,后渡汉水而向南入安陆、京山,继而攻入楚国都城。

二、楚昭王时期楚郢都地望

接下来探讨吴师所入之“郢”的具体地望。大凡

古代都城,都与大川有着密切关系,水系既可为城市人口提供充足水资源,也可作为对外水上交通要道。在大川附近营建都城,符合人类聚居的基本规律。楚人以王所居之城为“郢”,《史记·楚世家》及清华简《楚居》共同表明,“楚王徙郢”是较为普遍的现象。^[13]

关于楚人南迁之后的都城选址及所在,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纪南城遗址说^[14],二是宜城楚皇城遗址说^[15],三是当阳季家湖古城遗址说^①。纪南城与沮水、漳水相去甚远,其地南临长江,若想渡江,直接过江即可,何以劳师向西行后再渡沮水而济江;且纪南城考古材料显示,楚人以此为都城应在战国时期。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为楚郢郢,其所处地理及水系,也并不符合作为春秋晚期楚国都城的条件。^{[16](P73)}季家湖楚城遗址的城外分布着大量春秋早中期楚贵族墓葬,充分说明这些墓葬群附近应存在着一处春秋早中期的楚国都城,至少也应是楚王居住过的“郢”。在这些高等级的楚墓中,熊家冢最具代表性。徐文武先生^[17]、王从礼先生^[18]分别从文献、考古角度考证认为:熊家冢楚墓墓主即为楚昭王。熊家冢楚墓所对应的楚都如果是纪南城的话,那下葬路程太远,不合当时实际;但熊家冢和季家湖楚城较近,较符合实际。

季家湖楚城为春秋晚期楚昭王所居都城,还有重要考古材料作为证据。1973 年 5 月,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一号台基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19]。甬钟刻有十二字铭文,钲间有四字,铭作“秦王卑命”,左鼓有八字,铭作“竞坪王之定救秦戎”,该钟由此被称为“秦王卑命钟”,制作时间约在公元前 516~501 年之间^[20],即在吴师入郢前。“秦王卑命钟”铭文中,“卑”古同“俾”,即“使”之意,“卑命”有差遣之意,“定”为地名。该铭文通读的意思是:受秦王的差遣,楚景平王至定这个地方解救秦军。虽然只有短短十二字铭文,但因铭文中提到了秦王、楚王和与军事行动相关的珍贵历史资料,故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李零先生、黄锡全先生考证,铭文中“竞平王”即楚平王^[21]。李零先生还认为,将平王称为“竞平王”,是“双字谥”,正如楚襄王称为“顷襄王”,考王称为“考烈王”。上博简《平王问郑寿》,就有“景平王就郑寿,繇之于宗庙”句^{[22](P256~257)}。“竞”属群母阳部,“景”属见母阳部,景平王与“秦王卑命钟”铭文中的

“竞平王”为同一人。“秦王卑命钟”铭文中出现楚平王谥号,这说明该钟铸成于楚平王下葬之后,应在楚平王之子楚昭王在位期间。“秦王卑命钟”铭文的成功识读,为研究楚昭王所居之郢的地望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结合出土地点和铭文考察,铭刻楚国重要历史事件,与楚王有着直接关系的青铜甬钟出现在此,为确定季家湖楚城即春秋晚期楚国郢都,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证据。出土楚简材料也为确定季家湖楚城遗址为楚昭王时期郢都提供了充分支撑。上博简《昭王毁室》记载,“昭王为室于死湑之澍。”^{[23](P182)}黄人二先生将“死”转读为“葬”,通假转读为“漳”,并确定研究者“湑”释读为“沮”较为正确。^[24]简文的意思是:楚昭王在沮水边营建新宫殿。这说明楚昭王所居之郢都,必然与沮水、漳水很近,所建的宫殿紧临沮水和漳水。沮漳东接扬水可达汉水,水上交通极为便利,符合作为都城的条件。^{[16](P164)}笪浩波据清华简《楚居》及历史文献考证,也认为楚昭王所居楚国都城,在当阳季家湖楚城。^[25]综合以上分析,楚昭王所居的楚国都城,应在今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

三、对“涉睢济江”及“云中”的再分析

探讨了楚昭王所居之郢的地望,再看楚昭王“涉睢济江”及所入之“云中”。对“涉睢济江”的理解,是明确楚昭王逃跑方向的重点;对“云中”的理解,是弄清楚昭王逃向何处的关键。从心理上看,人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楚昭王最可能的逃跑方向是与吴军前来的方向绝对相反的。按传统观点,在吴军兵临城下的前一天,楚昭王还向吴军前来的方向奔逃至汉水之滨,这绝不合情理。在此,涉及两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一是睢水、江水何在,二是“云中”何在。

睢水,今作沮水;江水,即今长江。郦道元^{[11](P507~508)}、顾祖禹^{[10](P3504)}、杨守敬^{[26](P1159)}均认为,楚昭王时期的睢水,即为荆州今境内的沮水。对于“江”之所指,清杨守敬、现代学者石泉先生均以“济江”为“济沔”之误,并认为楚昭王所入之“云中”并不在江南,将区域意义上的“云梦”,理解为具体云梦之地,并确定昭王所奔之郢在汉水之滨。这主要是以先入为主的逻辑判断,认定昭王所奔之郢即在汉水之滨,为证实自己的看法,反过来断定文献中“江”即为“沔”之误^{[1](P394)}。

① 关于季家湖楚城的性质,学界多有讨论。高崇文先生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此处的“竞之定”编钟,认为季家湖可能是景之定之封邑。历来认为当阳季家湖为春秋中晚期郢都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杨权喜、刘玉堂、袁纯富、高应勤、郭德维等多有认同。

其实,“江”与“沔”字形相去甚远,被当时楚人误识、误记和混记的可能性相当小。江水和汉水在春秋时期楚国境东才有交汇,也并不存在“互受通称”情况。“江”“汉”之水,不仅当时楚人分得很清楚,就连居于北方的鲁国人也区分得很清楚。《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江、汉、睢、章,楚之望也。”《左传·定公四年》中楚左司马戌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可见楚人即使单称“汉江”时,也以“汉”呼而非以“江”称。更确切地说,楚昭王时期,楚人对境内水文地理早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江”“汉”不会弄混。

对“云中”的理解,还涉及“云梦”一词。“云梦”作为先秦时期地理名词,其所指地跨长江南北,包括今安陆、云梦、钟祥、荆门、枝江、松滋、监利等地。云梦不一定就是泽地,也可能是指山林原野。^[27] 先秦时期,“云梦”为楚王游猎的广阔区域,是具有相似地理环境区域的称呼,与今所称江汉平原的区域基本一致。后世以“云梦”与“云梦泽”相混,始自《周礼·职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薮。”“薮”,《说文》释为“目不明也”,与“梦”同音义。春秋时人所谓“九薮”,“薮”为大泽,云梦之内涵由陆地转向湖泽,云梦更与云梦泽混为一谈。^[28]

因“云梦”所指地域甚广,后世遂以“云”称江南,或以“梦”称江南,反之则称江北,这可能还与云(雲)、梦(薮)的古字字形相近有关。楚人常以“云”“梦”来略作区分,这让那些不太精通南方地理的北方学者,在指称楚境地理时,很自然地就产生理解上的混乱。战国时期,北方鲁国人多将“云”“梦”混淆,如《左传·昭公三年》载:“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又《左传·定公四年》记楚昭王济江而“入于云中”。西汉时期,《史记·楚世家》则记“昭王亡也,至云梦”^{[29](P140)}。宋沈括《梦溪笔谈》以《左传》为据,将“云梦”作“云梦泽”,并认为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云”“梦”分称至宋时期仍存。^{[30](P25)} 今张觉译注“云中”下引唐《汉阳图经》:“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以上古代文献的作者均非楚人或楚地之人,所生活的时代也与楚昭王时期相隔甚远,对楚境内地理环境的了解也并不全面,自然使后世专注于文献考据的学者对他们所引用的“云”“梦”“云梦”更加迷惑。

谭其骧先生研究,斗子文被弃之“梦”,其地在今云梦县境;昭王出逃之“云中”,在今松滋、公安县一带。^{[31](P82)} “梦”在今云梦县境,“江南之梦”也即楚昭王时期的“云中”,在今松滋、公安一带。^[27] 这些都是

比较中肯的说法,但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楚人以江为界,对“云梦”之地析而称之,反映了楚国地理特征对语言表达的影响。春秋时期,长江横跨楚境,是楚国境内最大的一条水道。唐孔颖达疏《禹贡》《左传》为“云梦跨江南北”之始^{[32](P79)},后世多从之。清代楚地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亦认同云梦地跨长江南北,并认为楚人对“云”或“梦”的称呼,“犹荆楚本一国,言荆则楚在,言楚则荆在”^{[26](P1034)}。楚人以“云”“梦”析称,就与长江横贯楚境有很大关系。其实,对“云”“梦”到底是指江南还是江北,大可不必拘泥字面表达。今以“江北云梦”“江南云梦”来称呼地跨长江南北的云梦之地,是比较合适的。

四、昭王所奔之郢的地望新探

楚昭王所奔之郢,是否即为汉水之滨的郢国呢?如确若此,那昭王济江的路线就很难解释得通。对昭王奔随路线的认识,可能还要重新考虑所奔之“郢”的地望问题。

“郢”,从邑、员声,后世多以“郢”同,并以两字互为异体字。因两字的字音、字义相同,后世均以“郢”“郢”相通。宋郑樵《通志·氏族略》:“郢氏,亦作𡇗,亦作郢,又去邑作云。”^{[33](P451)} 清杨守敬在考证郢国之时,以文献为据,亦认为三字相通。李晓明等人认为,郢祖先始于莱言,封于郢,郢为郑武公所灭,后郢国后裔迁徙至汉水流域建立郢国。^{[34](P105)} “𡇗”为族名,“郢”为族人所聚之城邑,“郢”则为封国名。以上三个字体现了“姓氏”“封邑”“封国”的转变历程。

郢国在西周初迁至汉水安陆一带。至楚若敖时期,楚国与郢国即存在联姻关系。《左传》中或别以“郢”“郢”,自宋以后文献多以“郢”为“郢”异体字,而同作“郢”。《左传·宣公四年》载:“初,若敖娶于郢,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郢,淫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左传》作者在记载斗子文之事时,以“初”开头,并记以郢之名,可见此段文献是参考了较早的文字材料。至楚武王时期,楚人征伐汉东诸国,郢国即是其中之一。公元前 701 年,楚武王与贰、轸两国结盟。《左传·桓公十一年》载:“郢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处于两国之间的郢国,与随、绞、州、蓼等共同抗楚,史称“蒲骚之战”。郢国反抗楚国,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 701 年)为楚国所灭。《左传》多记“郢”为“郢”,实际上也是将先前的郢国与后来的郢邑划上了等号。

当然,从宋时始,就有学人注意到“郢”“郢”是有

所不同的。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明《晏公类要》云：“楚灭郢，封斗辛为郢公。”^{[35](P2525)}清谢元淮考证：“郢为云泽，地在江之北，今安陆等处是也。郢为梦泽，地在江之南，今松滋、枝江等处是也。”^{[36](P499~500)}谢元淮以北为“郢”，以南为“郢”，或受历史文献记载及松滋所发现的“郢城”碑刻所导，故可能有所互误。今人谢承仁先生在点校杨守敬所著《郢国考》之时，就注意到了“郢”和“郢”当有所别，在点校文献时作“后楚灭郢，封斗辛为郢公”^{[26](P1033)}。楚武王在灭郢国之后，毁其宗庙，子民则被强迫迁至别处，或许并不是整个古郢国都居于一处，而是分散于各地。^{[34](P105)}至春秋中期，各诸侯兼并频繁，灭国常常并不意味着杀戮，而是将此国之人迁徙至本国境内并加以统治，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在灭蔡之后，“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徐少华先生认为，楚灭郢后或在他处另置郢县，又认为唐宋以后志书将郢国和郢邑合一。^{[37](P214)}因此，郢公斗辛所居郢国，即是楚武王迁至楚国境内的郢邑。

在楚昭王所入的江北的“云中”，的确是有一座郢城。据方志文献记载，明代松滋一带民人在耕作之时发现了一块断碑，上刻有“郢城”字样。^{[36](P500)}因该城缺乏必要考古资料，故还未引起学界注意。其实，在清代以前，松滋郢城就已引起了学人关注。《舆地纪胜》卷六四《江陵府》“景物”篇“郢城”条下引：“在(江)陵县南二百里。楚昭王时郢公所筑。今松滋楚城，一号郢城。”^{[38](P2201)}在此条文献中，“陵”字前疑脱“江”字，“二百里”所指非直线距离，宋人是指江陵县至松滋县旧县城(今松滋市老城镇)再转至小南海湖楚城遗址，经实测距离约 200 里，符合文献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松滋县“河东城”条下引旧方志文献云：“郢城，在县东南五十里。……亦谓之楚城，今为古墙铺。”^{[10](P367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荆州府古迹考”松滋“郢城”词条下记：“春秋时郢地，楚昭筑郢城于此。”^{[39](P10870)}元徐天祐注《吴越春秋》中的“奔郢”时说：“江陵有郢城，楚昭王时郢公所筑，今松滋也。”^{[40](P67)}清同治《松滋县志》、光绪《荆州府志》中亦多有类似记载。清松滋黄士瀛所作《春日郢城怀古》《乙丑春日登郢城循览一周》^{[41](P271)}，也是在郢城遗址处怀古所作。据黄士瀛实地考察，郢城为“楚塞边防”，并存有城垣遗址，该地后为水所淹。以上文献记载相对集中，且指向明确，这绝对不能用以讹传讹来论之了。

因此，楚武王在灭郢国之后，在今松滋一带极可能设立了“郢邑”。斗克黄，为楚箴尹，楚庄王时期平

定越椒之乱有功，心怀怜悯，楚王改其名为“生”，并封其为郢公。至楚平王时期的斗成然、楚昭王时期的斗辛，仍为郢公，可见斗氏多居于郢邑之中，其居地也应与楚都不远。^{[32](P11)}由此，以楚昭王渡长江而逃解释“涉江”之史实，就更符合当时历史实际。

2014 年，松滋市文物局在松滋南海镇小南海湖进行了水下文物调查，在鱼池及湖中的洲地上，经初步勘探就发现了大量遗物及建筑遗迹，还采集到了铜箭簇、石斧、瓷碗、瓷盘、陶灯盏等。城邑残垣壁厚达 1 米，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楚邑。这极有可能就是郢邑遗址。有关此遗址的情况，还有待更多考古发掘材料来证实。

五、由郢邑至随国的路线推测

至此，“昭王奔随”实际上可为两个阶段：一是“昭王奔郢”，二是由郢邑“奔随”。其实，古今学者对“昭王奔随”的路线已有了一些较接近史实的看法。南宋沈括对昭王奔郢路线有所认识。他概括为：由郢西过睢水，至于江南，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郢。其后又言，“云中”之地在江北。这也是认为，楚昭王是先过江至江南，然后再回到江北的云中。^{[30](P25)}辛德勇先生认为，昭王出奔的路线是：由郢都乘船入沮水，再转入江水，至云梦而折向东北至汉水西岸郢公辛所治的郢国，再到随国。^{[2](P92)}两者都缺乏对郢邑地望及实际情况的认识，仍不能很好地解释“昭王奔随”的路线。

对于“昭王奔郢”的路线，前已就楚昭王所居之郢以及郢邑地望重新做出了解释，因此，楚昭王是从季家湖的楚郢都西渡长江，由陆路至今松滋南海镇小南海湖一带的郢邑暂避。但是，关于楚昭王由郢邑“奔随”的路线，史料却记载甚少。从“奔随”结果分析，楚昭王西入今松滋一带以后，要想转至随国，必然要再次渡过长江。楚昭王出逃至随国，无外乎可选择走陆路或水路。春秋中期，楚人在沮水和汉水之间已开凿了“阳水”，“阳”通“扬”，亦称“扬水”，与沮漳河、汉江相通^{[16](P164)}；另外，在今荆州市沙市区的东部，亦有夏水至今仙桃一带入汉水的水上交通线路^[42]。为躲避吴军的阻击，楚昭王一行必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向随国行进，但如果选择水路，扬水与吴军所在楚都太近；夏水先向东南呈弧线而流入汉水，水路迂回且速度较慢，故走水路均不符合逃避战乱时人的心理和实际情况。楚昭王一行选择水路至汉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为尽快到达随国并脱离险境，楚昭王一行最为可能的路线就是选择陆路。

从《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来分析,楚昭王与斗辛等人应是过长江向东陆行至汉水。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定公四年》为楚昭王由郢奔随路线,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坐标,即“成臼”,“臼”今改为“旧”,其址在今钟祥旧口一带。^{[43](P317)}这也成为后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并多将楚昭王渡汉水之事,附加于“昭王奔郢”这一阶段中,使这段史事陷入了迷惑之中。在楚昭王由郢邑奔随之时,此时吴人已入季家湖一带的楚郢都之中。由今松滋南海镇小南海湖到钟祥旧口划一条直线,即楚昭王一行所选择的路线,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在今季家湖楚郢都一带的吴军,另一方面,此路线中还有一个权县,是当时楚国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借此城作为防御,也较合情理,走陆路至成臼后渡汉水,以汉水作为阻挡吴军的天堑,再北上随国。

楚史的研究,受历史文献缺乏的限制,因而对考古材料、历史文献的综合研究,就十分有必要。昭王奔随是吴楚争霸的重要转折点,对吴国、楚国争霸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随着吴楚争霸的发展,又给秦国以发展壮大的机遇,更影响了战国时期当时诸侯争霸的格局演变。基于以上对吴师入郢路线、涉睢济江、云中以及郢邑地望的新认识,本文形成了对“昭王奔随”路线的新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楚昭王在楚江南之地并无落脚之地,对昭王济江出逃至此的行为很不理解,故在研究逻辑上出现改变楚郢都位置等现象,这可能是忽视了对郢邑地望的考察。本文对松滋郢邑的关注,为解释和重新认识“昭王奔随”史实提供了新线索。

参考文献：

[1]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辛德勇.辨楚昭王“涉睢济江”的途程与所谓“江南之云梦”[A].旧史舆地文编[C].上海:中西书局,2015.
[3]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5]王謨.江西考古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6]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24(7).
[7]高崇文.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记吴伐楚路线辨析——兼论春秋时期楚郢都地望[J].江汉考古,2015(3).
[8]春秋左传正义(第四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宋耕耘.试析吴师入郢与楚昭王复国[A].王继平.中国史论集(中)[C].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

[10]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酈道元.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4(4).
[13]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J].江汉考古,2011(4).
[14]刘彬德.试论楚丹阳和楚郢都的地望与年代[J].江汉考古,1980(1).
[15]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J].江汉论坛,1963(2).
[16]刘玉堂,袁纯富.楚国交通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17]徐文武.熊家冢楚墓墓主身份蠡测[J].江汉论坛,2010(3).
[18]王从礼.熊家冢的有关问题思考[A].徐文武.楚学论丛(第一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19]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J].文物,1980(10).
[20]黄锡全,刘森森.“救秦戎”钟铭文新解[J].江汉考古,1992(1).
[21]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6).
[22]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3]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黄人二.上博藏简《昭王毁室》试释[J].考古学报,2008(4).
[25]笄浩波.从清华简《楚居》看“为”郢之所在[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4).
[26]杨守敬.杨守敬集(第五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27]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A1).
[28]李青森,等.云梦与云梦泽问题的再讨论[M].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9]张觉.吴越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0]沈括.梦溪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2002.
[3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Z].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
[32]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33]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4]李晓明.长江流域的古国旧邦[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
[35]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6]松滋县志编纂委会.松滋县志(民国本)[M].松滋县志编纂委员会,1982.
[37]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8]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9]古今图书集成(第八册)[M].台北:鼎文书局,1977.
[40]赵晔.吴越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1]张虎成.古荆州名胜诗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42]徐文武.“夏首”“夏口”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3]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